

走向 大科学的 经济学

——经济学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丛书

狄仁昆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丛书

狄仁昆 / 著

走向 大科学的 经济学

——经济学的哲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特约编辑 胡振平
封面设计 闵 敏

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哲学

狄仁昆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1998年12月新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80618-528-3/F·408

定价:15.00 元

序言：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起

H·赖兴巴哈在1954年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科学哲学的兴起(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那是在科学哲学不仅已经存在，而且已经获得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撰写的，其目的在于给传统的思辨哲学以更全面更彻底的打击。这里关于“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起”的论述则不然。首先它是指中国哲学界当前的学术动态而言的，因为在西方学术界，经济哲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副产品不仅早就存在，而且与经济学的发展相互交织、紧密相随。其次是这种论述恰恰是针对“兴起”本身的，即针对这种“兴起”的缘由、合理性、可持续发展性的论述。

一

当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兴起的根本缘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理论指导的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感觉的状况不仅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就绝大多数个体而言，其感受正如喝了混调的具有美丽色彩的鸡尾酒。

实际工作者一方面遵循着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直接指导市场经济中行为的理论而在摸着石头过河。为了避免多走弯路、减少损失，他们渴望正确的或有效的经济理论的指导。而我国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困惑决不比实际工作者轻，政治经济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差距是显然的，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被冠以“庸俗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帽子。对此，一

部分经济学工作者企图建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这好比是让科学知识削足适履地塞到形而上学框架中去，类似黑格尔自然哲学体系中关于氢是正的、氧是负的、碳是对立统一之类的魔语。结果是非驴非马，只好不了了之。有鉴于此，另一部分经济学工作者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种想法一方面是认识到要抛开既定框架的束缚，另一方面是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但科学理论在一个领域只有一种，正如我们不能搞一个无产阶级的或有中国特色的力学一样。谁要是这样搞，谁就不懂得科学，不懂得理论的普遍性品格。不仅理论的特征如此，就是一种论述也是如此。G·弗雷格在对语言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后认识到：一种论述越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其作者的民族性也就越不容易辨认出来，也就越容易翻译^①。可见，企图搞什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人不懂得这个基本道理，不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完全是两回事。

由困惑产生渴望和需求，一部分经济学工作者正是由上述困惑而产生了哲学分析的需求。然而，与经济学学术界相似的是，在当前我国的哲学研究中也有着一种困惑。这就是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给我国政治、思想界带来大解放之外，一方面学术研究本身呈现了某种贫乏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研究的贫乏状态又造成了研究者的贫困状态。虽然说哲学不是科学，哲学研究不能像科学研究特别是科技研究那样讲究功利性，但是，哲学研究本身有没有一个现实意义问题，有没有一个有效性问题，乃至是否要与国际哲学界对话、交流问题是需要思考的。出于上

^① M.K. 穆尼兹：《当代分析哲学》第三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述思考,一部分哲学工作者转向了尚处在模糊概念中的经济哲学研究。这种模糊性主要是指不少热情地投身于经济哲学研究的学者,对于“什么是经济哲学”的认识尚处在模糊状态,并且他们目前所从事的“经济哲学”研究,也不一定符合经济哲学学科的要求,或者说,其实并不是经济哲学研究。

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经济哲学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二次,第一次是1994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是199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两次会议基本上反映了全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各种观点和态度,对开展经济哲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建立和加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合作和联盟,建立和加强理论家和企业家的合作和联盟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就两次会议上反映出的经济哲学观而言,错误的和不适当的经济哲学观占据多数,言之成理的可持续研究的尚属凤毛麟角。

大体而言,错误的经济哲学观表现在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经济生活上贴标签的“研究”,和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所谓经济哲学体系的“研究”中。这种经济哲学既无益于经济学研究,也于从事现实经济活动的人无补。而且这种“创造”难免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一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著作,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和观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观。不适当的经济哲学观表现在那种把经济哲学看作是经济学与哲学的相互渗透,是所谓的既改造了哲学又改造了经济学的交叉性学科的观点上,虽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交叉结合将使经济哲学成了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所以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是不适当的。此外,那种追求哲学功效性的愿望,那种误解了理论联系实际口号要求的学者,把经济哲学看成为应用

哲学的观点也是不适当的。虽然科学有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虽然理论工作者要关注现实的经济问题,并且也可以和应该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哲学层次的思考,但它一方面不能替代科学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仅仅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并不构成一种新的哲学——经济哲学。事实上,“应用性”只是实证科学的特有品格。要求哲学有应用性本身就混淆了哲学与科学的界限。

二

如果不能明确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那末有理由怀疑经济哲学研究的热潮是否能持续不退。建国以来,在哲学界类似的经验教训不少,诸如关于辩证逻辑和科学逻辑的研究,由于不符合逻辑本身的标准,划不清与形式逻辑的界限,最终未能取得确实的成果。虽几经兴旺,仍难免偃旗息鼓。再如自然辩证法研究,曾经声势浩大,并在学科地位上得到官方认可,但由于不符合公认科学哲学标准,与辩证唯物论划不清界限,始终无法展开国际学术交流,现在所剩下的主要只是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了,而这种研究主要应依赖处在第一线的自然科学家。至于近期曾经局部发热的管理哲学研究,由于研究者一上来就把它定位在“应用哲学”位置上,企图解决管理科学难以妥善解决的一些管理现实问题,则始终未能获得管理界和哲学界的认同和肯定。

其实任何现实问题都是一个具体,认识和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不是哲学能胜任的,甚至也不是某一门科学能胜任的,经济问题也是如此,它往往还要涉及到人口、教育、科技、管理、体制,乃至环境等诸多方面,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给出某一领域的正确的理论,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它,从而使得从事该领域实际工作的人能减少乃至消除盲目性,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也不例外。现在的问题是

经济学家面对着各种经济学,对于这些内容和性质不同的经济学的正确性、合适性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性的认识意见纷呈,产生了困惑,统一认识、消除困惑才是经济学家寻找帮助的主要动机所在。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曾经说过:“经济理论上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这方面很需要哲学界同志们的帮助。”^① 总之,经济学家寻找哲学家的帮助,与哲学家结成联盟是要对经济学进行哲学考察,其中特别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性、实证性或曰科学性状况的考察可谓当务之急。因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关于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学科,而我国现在实施的也是市场经济,但我国的社会性质又与西方不同。所以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而且对世界学术界而言,也是个重大的新课题。

然而,迄今为止从事经济哲学研究的大多数哲学工作者都是本着为哲学“找出路”的动机投入的,他们一下子就把“经济中的哲学问题”或“经济运行规律的哲学分析”作为当然的主攻方向。并且由于年龄和原有知识结构等特征“跨越了”学习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个必须阶段,这就成了恩格斯的不肖子孙。相反,很可能使自己变成杜林式的吹牛家。

因为这样的经济哲学研究实际上是把“社会经济运动”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并主张在对社会经济运动的研究中实现哲学。如果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运动”,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一种可能的辩解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进行不同性质的研究并形成不同的学科。但是,只要稍微冷静地思考一下疑问就涌现出来了。第一是整个人类文明

^① 《哲学研究》1987年第8期。

史表明,对任何现实事物的或现象的有意义有成效的研究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因为哲学研究既不可能获得可检验的结果,也不可能获得公认一致的结论。这就使得众说纷纭的哲学知识难以直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第二是同一个研究对象的不同视角研究虽然可形成不同的学科,但它们都是作为科学学科的一个门类而存在的。诸如以物质及其运动为研究对象,既有力学、物理学,也有系统科学;以人类个体为研究对象,既有生理学、医学,也有心理学。

可见,我们不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抢过来作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科学,这正如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一样。因此,经济哲学是对经济科学的哲学考察,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属于部门哲学。并且,经济哲学的学科级别属二级标准学科,因为它是以前别的学科为考察对象的,它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明确了经济哲学的上述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级别,既不会去抢经济学的地盘,又允许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乃至与国际经济哲学学术界进行对话和展开相互批评,因为整个研究的内容和性质是同一的,即都以回答“经济科学是什么”为根本课题。但各人或各家给出的关于经济科学是如何和应当是如何的回答却可以是不同的。诸如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的状况如何,经济科学是否应当向自然科学看齐,经济科学能否像自然科学一样,等等的回答显然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哲学研究才会是持续发展的,并且才可期望正在兴起的经济哲学研究将对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都起到推动作用。

三

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如何按照一般理论研究

的科学态度,去认识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将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主要基础问题。”但是,“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理论的价值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研究难度十分大的学术问题。”^①因此,迄今为此,国内学术界似乎尚没有一本以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全面哲学考察为内容的,符合上述关于经济哲学学科定位要求的专著。就此含义而言,本书大约是国内第一本经济哲学专著。

与国内一般学术专著不同的是,本书针对当前学术界的状况,首先以一章的篇幅回顾和总结了百余年来西方经济哲学研究的演变历程和现状。以期使得读者对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对经济哲学研究与经济学发展之间的促进关系,对经济哲学的基本课题和研究方法,对当前存在的经济哲学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及它们对经济学和哲学的意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虽已作出艰苦的努力,但限于资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疏漏乃至欠妥之处在所难免。

本书遵循国际学术界经济哲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并进而将考察的核心放在对经济学科学性状况的哲学分析上。虽然这种哲学分析是在经济学对象、方法和知识三个层次上全面展开的,但考虑到经济学本身的演变情况,本书没有机械地分别论述,以期避免理解上的片面性。

就我所知,本书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所必须具有的性质出发,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变迁的论述;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可能世界出发,对“经济人”假设方法论的考察;从当代科学哲学“新认识论”视角,对作为“理解学说”的经济学知识特征的哲学分析;从

^① 陈璋、陈国栋、刘霞辉:《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作者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实证方法论品格的多元性出发,对经济学原理证实方法论功效的剖析;从知识性质上的差别和可转化分析出发,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结构的概括;从建构和解构不断更替出发,对假说证伪方法论的实质乃至经济理论增长模式的揭示;最后,从对事实 I、II、III 的创造性区分以及从理论检验的双向性出发,对经济学事实和检验的复杂品格给出了哲学解释。所有这些研究不仅是崭新的,而且是有一孔之见的,尽管也是不太成熟的,需要经受批评、争辩和再研究的。

本书实际上主张有具备普遍性品格的“市场经济学”,并且正是从这种“市场经济学”视角出发来考察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性、科学性水平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 P. 肖教授在给我的多次来函中都指出,本世纪经济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科学性水平的提高上。尽管经济学毕竟不同于经验自然科学,并且迄今为止也仍然不能说经济学已经是科学的了。

然而今天的经济学确实与古典经济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正如今天的哲学与传统的思辨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样,思辨哲学的历史被认为是提出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来的人们的“错误的历史”,对于他们居然作出的各种“回答”,唯一可能的只能有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今天的(科学主义)哲学的历史则是“问题发展的历史”,问题及其发展,第一是在逻辑分析及逻辑分析的发展中实现的;第二是科学中给出回答的,但这种哲学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大一统的体系。我们看到,古典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等等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回答,实质上也都是“居然作出来的回答”。他们只能给经济现象以“理解”,而不能对经济现象以预测,因为现象似乎根本不理会那个所谓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本质世界,从而使得这种“理解”也是建立在心理类比基础上的,它不仅可以因人而异,而且在不同的经济领域给出的“理解”有时会产生冲突。

自“边际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第一实现了对整个经济领域、经济现象的统一说明,即实现了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贯性要求。就此而言,它遵照了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标准,当发现有逻辑不一致情况时,这就是发现了概念问题,概念问题是经济学家不能回避和必须解决的。第二它通过自己的发展,走上了经验验证和预测的进步道路。尽管计量(实证)经济学尚不成熟,作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工具尚有诸多差距,甚至有些差距很可能永远无法彻底消除,但这种发展方向是合经验自然科学标准的,这也是本书以“走向科学的经济学”作为主题的根本理由所在。

走向科学的经济学在其前进道路上,仍将不断地遇到概念问题和经验问题,仍将不断地迫使经济哲学重新审视经济学,并要一如既往地为一经济学解决问题提供启示和方向,包括通过修改、调整、发展经济学来消解问题的方向。所以,经济哲学的历史也是问题发展的历史。

最后,走向科学的经济学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走向经验自然科学的经济学,我们不能排除,当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它不仅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光辉典范,而且迫使经济哲学家不得不思考:是否存在一种“更高”的新科学?从而应称其为“大科学”,这就使得本书的书名定格在“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上。

目 录

序言: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起	(1)
第一章 导论:西方经济哲学研究辨析	
——从过去到未来.....	(1)
一、跨越世纪的理解历程.....	(3)
1. 第一次经济哲学研究高潮	
——经济学应当是如何的?	(4)
2. 第二次经济哲学研究高潮	
——经济学是如何的?	(9)
3. 第三次经济哲学研究高潮	
——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的?	(19)
二、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清道夫”	(33)
1. 西方经济哲学类型辨析	(33)
2. 经济学前进道路上的“清道夫”	(38)
三、从解析到解构	
——未来经济哲学研究展望	(45)
第二章 经济学对象论	
——从具体到一般的变迁	(56)
一、古典经济学对象的模糊性与理论的前科学性	(57)
1. 以具体为研究对象的早期古典经济学	(57)
2. 以特殊的抽象为研究对象的李嘉图经济学	(59)
3. 彷徨与探索	(61)

二、对“边际革命”的新理解	(65)
1. 基本课题的发现和确立	(65)
2. 从折衷的对象到折衷的理论	(67)
3. 研究方式的转换和知识形态的转变	(71)
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二重性	(73)
第三章 从可能世界出发	
——“经济人”假设方法论	(77)
一、“经济人”含义的演变和完善	(78)
二、“经济人”假设方法论的认识逻辑	(82)
三、“应当世界”的认识论意义	(87)
第四章 “理解学说”辨析	(96)
一、从“趋势定律”到“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	(96)
1. “趋势定律”的经验意义	(97)
2. 对“不可辩解经验命题”的辨析	(100)
二、为经济宇宙立法和法则的多元性	(107)
1. 可能高于现实	(108)
2. “证实”与“解释”	(113)
第五章 经济学的实证转向	(119)
一、从“分析的”到“经验的”	(120)
1. 效用研究的新阶段	(120)
2. 两个区分	(124)
二、预测与检验	
——“羞羞答答的”证伪方法论	(130)
1. 检验什么：前提还是预测？	(131)
2. 理论与经验的双向鉴别	(134)
第六章 作为上层建筑的可能必然真理	
——经济理论的结构分析(上)	(141)

一、作为“范式”的新古典经济理论·····	(143)
二、新古典理论命题系统哲学分析·····	(150)
1. 需求价格理论·····	(150)
2. 厂商理论·····	(153)
3. 一而二的生产与分配理论·····	(157)
三、论可能必然真理·····	(163)
第七章 作为下层建筑的现实偶然知识	
——经济理论的结构分析(下)·····	(168)
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知识·····	(169)
二、对作为假说的准实证经济知识的哲学考察·····	(177)
1. 需求实证研究分析·····	(177)
2. 消费理论实证研究分析·····	(182)
3. 生产函数实证研究分析·····	(192)
4. 投资理论实证研究分析·····	(205)
5. 货币理论实证研究分析·····	(211)
三、大树结构	
——作为大科学的当代经济学·····	(228)
第八章 增长的模式·····	(231)
一、比较综合增长模式·····	(232)
二、假说竞争解题增长模式·····	(239)
反思与展望: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	(249)

第一章 导论：西方经济哲学研究辨析 ——从过去到未来

标准的经济哲学与科学哲学都是本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生儿。所不同的是，科学哲学是近代形而上学研究的无结果和认识论研究的根本困难，迫使哲学寻找新出路的产物；而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研究屡遭根本性的概念问题和经验问题的困惑，屡遭危机，需要借助哲学特别是已经取得公认成果的科学哲学帮助的产物，著名经济哲学家马克·布劳格就要求人们干脆把他的《经济学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①。

科学哲学以经验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经济哲学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就研究性质看它们是相同的，都属于部门哲学研究。然而，经验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性质、状况并不完全相同，以相对确定的自然物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经验自然科学，从获取知识的活动到获取的知识这两个方面看，都既具有确定性又在人类知识中具有典范性，这就使得它作为研究对象既是可行的又是有价值的。而以人与物的关系和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其自身的研究对象显然有突出的不确定性。首先是人与物的关系在根本上就是一种相对关系，它因人的意识、意愿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多元关系；从而人与人的关系则更以意志自由的人的活动为转移，这是一种多重的多元关系。因此，这里的所谓

^①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序言”，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事实”，并不是既定客观的东西，并不是据此可以鉴别意识客观性状况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往往正是某个或某些意愿支配的结果，不存在意识客观与否的问题，这也就是所谓“市场总是正确的”格言的真谛所在。诸如那怕是一只亏损公司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中以每股 100 元的价格成交，你指责这笔交易是错误的毫无意义的。

其次是经济学的观察和研究还面临着两元的立足点。这是因为研究和观察者也是被研究和被观察者中的一个分子，你“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而当你以观众视角理解的东西作为演员可能不理解，反之亦然。这正如相对论力学所表明的，在一个参照系中被称为“同时”发生的事件，在另一个参照系中却被认为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这样，经济哲学研究就可能会面临近乎悖论的处境：一方面，它仅仅是把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关于“什么是科学的”标准应用于经济学，并据此标准来裁定经济学的是非曲直，指出经济学的纰漏和指导经济学应该如何；另一方面，由于被衡量的经济学远比自然科学复杂，这里有许多经验自然科学中不曾出现过的新情况，从而显示出这个“标准”的简陋粗糙，显示出制定这个“标准”的科学哲学家的粗心和“肤浅”。诸如当经济哲学家断言“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时，对该断言的理解完全可以沿着两个正相反对的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经济学距科学标准尚有差距，尚须继续朝该标所要求的方向进步；第二个方向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比自然科学更复杂更高级，关于“科学是什么”的回答，尚须参照经济学的性质、特征进行修正和完善。

经济哲学研究的这种二难处境，在经济学发生危机时尤为突出。即一方面，它必然引发依据（自然）科学要求对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对经济学假设和整个研究方式的反思，以求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又会引发对理论检验和预测本身，乃至对“规律”